

满学论丛

【第四辑】

赵志强 主编

北京市社会科学学院满学研究所 主办

辽宁民族出版社

满学论丛

【第四辑】

赵志强 主编

北京市社会科学学院满学研究所 主办

辽宁民族出版社

© 赵志强 201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满学论丛. 第4辑 / 赵志强主编.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5497-0871-0

I. ①满… II. ①赵… III. ①满族 — 民族学 — 中国 — 文集 IV. ①K28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5681号

满学论丛

MANXUE LUNCONG

出版发行者: 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者: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有限公司

幅 面 尺 寸: 180mm×250mm

印 张: 25.5

字 数: 420千字

出 版 时 间: 2014年9月第1版

印 刷 时 间: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责 任 编 辑: 吴昕阳 李 璜

封 面 设 计: 杜 江

责 任 校 对: 林 华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97-0871-0

定 价: 60.00元

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网 址: www.lnmzcb.com

举报电话: 024-23284336

邮购电话: 024-23284335

联系电话: 024-23284340

淘宝网店: lnmz2013.taobao.com

《满学论丛》编辑委员会

主 编 赵志强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关纪新 刘小萌 吴元丰 杨 珍

定宜庄 赵令志 哈斯巴根 徐 凯

常越男

秘 书 王鸿莉 晓 春 戴光宇

| 目 录

卷头语	徐 凯 赵志强 \ 001
从有关“明清鼎革”的话语，看清人的民族与国家认同	刘风云 \ 004
清初满蒙关系的建立对清代历史的重大影响	杜家骥 \ 023
从《崇祯历书》到《时宪历》：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述论	沈定平 \ 037
西方传教士：明清鼎革中的特殊角色	吴伯娅 \ 053
清宫中的最后一名法国耶稣会士：贺清泰	张西平 \ 068
太后下嫁研究钩沉——驳太后下嫁说	滕绍箴 \ 089
李自成与多尔衮进北京施政之比较	张 杰 \ 116
天启年间故宫“三殿”重修与晚明政局 ——以三份“兵部档案”为线索的考察	彭 勇 \ 130
明清鼎革中的汉人及其华夷思想	周喜峰 \ 149
清代恰喀拉人的社会与文化	吕 萍 \ 163
清代瑗瑊区域达斡尔人的历史变迁	谢春河 \ 172
清前期北京寺庙满文碑初探	关笑晶 \ 185
内务府旗人在京旗社会中的影响 ——以叶赫颜札氏家族为例	杨 原 \ 202

论龚鼎孳

廖晓晴 \ 218

明清两朝应举与史笔褒忠讽降

——傅维麟于明清鼎革之际的命运抉择与史家心态

武玉梅 \ 228

明清易代之下清初京籍士人的学术关怀

刘仲华 \ 240

王弘祚：《贰臣传》中唯一的云南籍人

邹建达 \ 261

明清鼎革之际的祖大寿

张丹卉 \ 272

钱谦益的多重释读

王鸿莉 \ 280

明清之际的孟乔芳与西北政局变革

陈 跃 \ 288

满语口语中的辅音浊音化现象

金周源 \ 299

明清鼎革时期的满语文学

赵志忠 \ 310

满语词缀-tala/-tele/-tolo的语法意义

晓 春 \ 330

满族农作物词汇浅析

戴光宇 \ 335

产业技术理论化与明末清初江南社会经济转型

余同元 \ 345

四平市周边明清遗迹的考察——从辉发到叶赫

刘小萌 聂有财 \ 357

“社会转型视角下的明清鼎革”学术研讨会综述

常越男 \ 385

后 记

\ 399

卷头语

徐 凯 赵志强

今年恰逢清朝入关、定鼎北京370年，也是明朝灭亡370年，李自成成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失败370年。明清之际一个“天崩地圯”的时代，改朝换代，整个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大改革时期，使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

明清鼎革，社会转型，这是一项重大的历史事件，长期为学界所关注。早在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揭示李自成农民军首领失败由骄奢腐化所致，此文成为1942年中共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参考教材。20年前，1994年，正逢甲申350周年，在沈阳，由孙文良教授主持召开的“清兵入关与中国社会——第七届全国清史暨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就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展开研讨。20年后，2014年，又逢甲申变故370周年，在这特殊的时刻，尤其是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与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社会转型视角下的明清鼎革学术研讨会”。学者相聚北京，再次讨论明清之际社会转型问题，总结历史经验，为推动当今改革提供启示借鉴。因此本次学术讨论会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又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今天我们从社会转型视角研讨明清鼎革，此命题既是个老问题，又是个新问题。改革开放30余年，史学近代化研究迅速发展。80年代以罗荣渠教授为首，北京大学成立了史学现代化研究中心。他的大作《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新论续编——东亚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堪称我国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奠基之作，也是正在走向世界现代化研究中国学派的代表性著作，引起中外学人的广泛关注。史学新领域的研究从理论与实践层面上总结以往中国和世界近代化发展的艰难历程，为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弥足珍贵的经验。

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始于何时？表现情况怎样？学界看法不一。按照经典作

家的理论和方法，人类社会要经历五个发展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17世纪中期，英国率先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该国又完成产业革命，并引起欧洲各国的连锁反应。资产阶级革命同时又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一批自然科学家伽利略、哥白尼、牛顿等在科技研究上大放异彩。而此时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明朝、大顺农民军、清王朝三股政治势力正在金戈铁马声中逐鹿中原，原本占传统优势的中国科学技术也随之落伍。尽管中外各国的近代化时间、程度各异，但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化。这是人类社会必须要经历的一个漫长历史发展阶段。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促进了这种发展。”^①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至60年代，遵循毛泽东的前一句话，学界掀起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大讨论。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有资本主义萌芽，时间在16世纪中叶，即嘉靖、万历时期。地点在长江三角洲的南京、苏州、杭州一带，出现在纺织行业之中，表现方式则为“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罔籍田业”的农民失去了土地，依靠“趁织为活”，“日取分金，为饔餐计”。其“萌芽”的程度是微弱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雇佣生产方式还无法撼动根深蒂固的封建租佃关系。本次大讨论持续了十几年，当时一批著名学者几乎均参与讨论，先后出版了三本论文集^②，当时被誉为中国史学“五朵金花”之一。足见学界对此重视的程度。

我国改革开放伊始，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也随之传入。学人以“社会转型”，或以史学近代化、现代化的探究，取代了“萌芽”的讨论，成为中国学界关注的热点课题。从近代化的视角讨论明清时期社会的变迁，突破了以前单纯围绕“萌芽”论证明清社会变化的简单模式，使人们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第589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

② 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辑《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收入33篇论文；1960年，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辑入20篇论文；1980年，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明清史教研室再编《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编入25篇论文。

去认识传统社会的结构，解释影响社会发展的诸因素，阐述对社会形态的认识。这种研究方式的转变，起到了解放思想、促进学术发展的作用^①。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蜂拥而入，中国出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外国列强在中国设立船舶修造厂，原料加工厂，经营交通运输，修筑铁路，开设银行，开办煤气、电力和自来水公司等公用事业。在“师夷长技以制夷”、富国强兵的思想指导下，清朝兴办洋务，创办民族工业，训练新军，建立新式学堂等，引进西方先进的科技与管理方式，培养人才，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正是毛泽东的后半句话所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促进了这种发展。21世纪初，学界仍关注社会转型问题研究，张显清等完成《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项目，这是一部学术力作。前些年西方兴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强调西方文明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知识体系的重建，以及这种知识体系对历史的影响，值得我们参考。

本次会议主题“社会转型视角下的明清鼎革”，是以往研究的继续，围绕着社会变革、重大历史事件与人物、“华夷之辨”到“中外一体”、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等4个方面展开讨论。收到与会的中外学者撰写的学术论文47篇，内容包括国家民族认同、官制、吏治、人物、财政、科技、外交礼仪、中西文化、文学、满语文、风俗等。既有宏观纵论，又有微观探索。不少论文视角新，论点新，史料新，取得了新的突破。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探讨了明清之际的社会转型，提出有益见解，读后颇有启发。

因篇幅有限，兹选取部分会议论文收录于本辑中，以飨读者。

^① 参阅高翔：《论清前期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趋势》，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从有关“明清鼎革”的话语，看清人的民族与国家认同

刘风云

民族与国家认同的话题是近年最为学界所关注的热点之一，也是“新清史”的一个核心议题，将其置于明清鼎革的历史环境下进行考察，或许能对当今的一些讨论提供一些论证的依据。而有关明清鼎革的一些问题，学界虽多有研究，但换一个视角，似乎可以使一些认识分歧得以梳理。

总之，历史问题只有在讨论中才能得到接近于真实的答案。而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在讨论古人的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时，似乎应该注重时人自身的话语体系，以寻求他们自身的价值认同。

一、“汉奸”的由来

“汉奸”，即汉人中的奸恶之徒。通常，我们对“汉奸”的认识，是指那些背叛中华民族和国家，丧失民族气节的无耻之徒，与“卖国贼”并称，是中国人最不能容忍的一种道德与气节的沦丧。对于这类人群，无疑以抗日战争中那些卖身于日本侵略者、助其屠杀中国人的丑陋形象最深入人心。因此，这里的“汉奸”应该是建立在对中华民族及中国认同基础上的话语。但说到这里，有一个现象不能忽视，就是在社会上以及学术界还有一些人将在明清改朝换代之际投降清朝的汉官汉将称作“汉奸”，如洪承畴以及清初三藩王吴三桂、耿仲明、尚可喜等都被指称“汉奸”，吴三桂尤其是家喻户晓的“大汉奸”。而且，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中，“汉奸”的话语及其由来也应该来自明清鼎革时期，甚或就源于“引清人入关的吴三桂”等人。

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将明清鼎革中投降清朝的汉人文武官员视为

“汉奸”，这能否代表明清之际的民众对于满洲入主中原而发生的改朝换代的一种民族认同呢？如果是，那又是谁给这些降清者戴上了一顶“汉奸”的帽子？是代表朝廷的官方？抑或社会大众？对此，我们需要从“汉奸”话语的源头说起。而鉴于学界已有相关讨论，这里将从研究成果的相关部分进行梳理展开。

在对“汉奸”的研究上，有两人的成果值得关注。一是王柯的《“汉奸”：想象中的单一民族国家话语》，另一是吴密的《“汉奸”考辨》^①，就“汉奸”产生于何时，王柯以及吴密给出了相近的看法。可梳理归纳为这样几点：

首先是王柯认为有三种说法：一是西汉说，即清末章士钊在《汉奸辨》中开篇言：“中国汉初，始防边患，北鄙诸胡，日渐交逼，或与之和亲，或与之构兵，由是汉人之名，汉奸之号称焉。”惜章士钊没有引论出处。二是宋代说，根据《汉语大辞典》中，宋人王明清的《玉照新志》卷三提到，“桧既陷此，无以自存，乃日侍于汉奸戚悟室之门”。这一说法广为流传，以至于许多学者径直采用此说。美国汉学家魏斐德就据此认为“‘汉奸’这一复合词最早流行于宋代，指为女真人的金朝充当密探的汉族（即中国）官员”。然而，此说经王柯考证，诸多版本的《玉照新志》中并无汉奸一词。

由于前两种说法不是没有出处，就是查无实据，所以难以取信，在这一点上，王柯与吴密没有分歧。

第三种说法是“清朝说”。王柯指出：“尽管从《汉书》开始，‘汉人’一词就被用作区别周边人士的共同体，然而直到《明史》为止，‘汉’字一直没有越过政治共同体、地域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领域，而具备鲜明的民族共同体的意义。所以直到明代为止，中国社会没有流行过‘汉奸’一词。”“体现出民族共同体意义的‘汉奸’一词，最早出现于康熙中期。”但是，吴密却有异议，并推出第四种说法，认为汉奸一词最迟在明末产生已无疑义。根据是，在天启元年（1621），西南地区发生了土司叛乱，在水西土司的善后和治理过程中，明朝官员杨嗣昌和朱燮元都曾使用了“汉奸”一词。

既然明末就有“汉奸”之称，那么明清之际指责降清者为“汉奸”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所以，其次我们要讨论的是“汉奸”的

^① 王柯：《“汉奸”：想象中的单一民族国家话语》，载《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吴密：《“汉奸”考辨》，载《清史研究》2011年第4期。以下引证，均参见于二人以上文章。

语义。

王柯与吴密在考察“汉奸”的语义时，都认为“汉奸”最初是指在西南苗疆改土归流中起破坏作用的汉人。王柯指出，雍正时代，“汉奸”问题见于国内的民族关系。但是到了道光年间，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汉奸”走出中国国内民族关系的圈子，变成了中外国际关系上的“通敌”问题。但这时的“汉奸”毫无种族上的意义。不是出卖了“汉人”的利益，而是出卖了“天朝”的利益。吴密则对汉奸的释义下了很大的功夫。他批评王柯从“通敌”的角度把握汉奸一词取义过狭，指出在官书档案中，汉奸通常用来指称与“生苗”、“生黎”、“夷匪”、“生番”、“野番”、“逆夷”等等所谓的“化外”民族交往，违法滋事，在外作乱的汉人。汉奸行为不仅指战争或敌对时的通敌附敌行为，还包括诸如走私贩卖、与异族通婚、教唆作乱、侵占田宅、违禁取利，与外国人交往等等一系列行为。而且，吴密考察了鸦片战争以来“汉奸”话语的含义及其嬗变。认为，在鸦片战争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官方在汉奸的认定上非常宽泛，那些受雇和帮助外国人的汉人常常被当作汉奸加以处置，沿海边境之民随时都有可能被贴上汉奸的标签。

对照二人的研究，通过对最具官方语言性质的《清实录》的检索，可以看到，自雍正朝，《清实录》中开始出现“汉奸”一词，如雍正二年（1724）五月，“谕四川、陕西、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督抚提镇等，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每于所属土民多端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马牛、夺其子女、生杀任情。”而“土司之敢于恣肆者，大率皆由汉奸指使”^①。根据雍正帝的指示，云贵总督鄂尔泰在条陈地方事宜时，将“汉奸宜禁”列为第一项，理由是“顽苗肆恶，专仗汉奸”^②。在乾隆朝实录中，“汉奸”一词仍然是指西南“苗疆”中的不法汉人，但地域已扩展到广东、广西、四川、直隶、福建、西藏等边省，泛指汉人“通夷情事”^③。值得提出的是，乾隆朝的“汉奸”话语已经跨越了国界，出现在清朝对缅甸的战争中。乾隆帝有谕旨曰：“缅地汉奸，大率不过奸商及矿丁两种，自当设法严禁，以清其源。此等谅皆游手无赖之徒，羁栖异域，止图自贍其身，罔顾利害，甚且漏泄

① 《清世宗实录》卷20，雍正二年五月辛酉。台湾华文书局1969年版，以下版本同。

② 《清世宗实录》卷52，雍正五年正月壬子。

③ 《清高宗实录》卷169，乾隆七年六月丁巳。

内地事情，实为沿边蠹病。”^①

从上述文献资料的记载似可以断定，“汉奸”的话语的确首先出现于“苗疆”，是作为官方语言痛斥那些破坏清政府在西南贯彻改土归流政策的汉人，泛指与政府作对的汉人“奸民”，并没有卖国贼子的语义。缅甸战争中出现的“汉奸”，表明汉奸现象在延及“苗疆”以外内陆边疆的同时，也突破了中国国内民族关系的圈子。但由于当时清朝所拥有的宗主国地位，虽然汉人有私通敌国行为，却也非同今天意义上的“汉奸”。这种情况在道光朝以前并没有发生改变。

但是，伴随近代中国不断遭受西方列强侵扰的耻辱，在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沦丧中，中国人的主权意识及国家民族观念也开始形成，“汉奸”一词的语义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吴密认为，“汉奸一词在19世纪末20世纪之初完全超脱了汉人的范围”，他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光绪二十六年五月（1900年6月）清政府发布了对十一国列强宣战的诏书，其中有：“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怯，甘心从逆，竟为汉奸，朕即刻加诛，决不宽贷”之语。而在御前会议的和战讨论中，主和派立山（蒙古正黄旗人）、联元（满洲镶红旗人）、袁昶、徐用仪和许景澄等五人，被主战派以“汉奸”罪名诛杀。所以，这一时期的“汉奸”不仅突破了汉民族的界限，凡是有出卖清朝中国行为的人，不论满人、蒙人都会被认定为“汉奸”，其行为泛指卖国，“汉奸”往往也会被称作“汉奸卖国贼”。

由此似可以认为，在外国侵略势力面前，清朝的子民已将自身利益同清王朝代表的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汉奸”的汉人属性在西方列强的频繁入侵下被打破，广大民众在感受中华民族危亡中形成了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

然而，“汉奸”一词并未至此形成固定语义，它在清末随着革命派的兴起再一次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转而成为国内满汉种族冲突的一把利器，成为革命派攻击立宪派或保皇派的重要理论依据。

众所周知，孙中山作为辛亥革命的领袖，在辛亥革命前也是一位倡导种族的排满人士，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口号，有着鲜明的种族性，虽是基于对清政府丧权辱国及对民众尤其是广大汉人沉重压迫的失望，却因他这面精神旗帜得以广为宣扬。在这种形势下，明清易代史成为满汉冲突

^① 《清高宗实录》卷849，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丁卯。

的重要知识资源，革命派往往借此历史记忆去焕发汉族民众的抗清排满情绪。

如此一来，在革命派的表达中，“汉奸”的语义加进去新的内涵，但边界却十分清晰，就是专指明清之际投降清朝的汉官汉将。这里，我们可以借用革命派人士刘坤一的一段精彩表述。

刘坤一有曰：“自有一种汉人，为之鹰犬，效其爪牙，以作向导。于是地势不悉者，则为之指示九州十八省之要道，而使之占领矣。文字不通者，则为之授课孔孟程朱之书，而使之渐进文化矣。风俗不谙者，则为之教以饭食，教以婚姻，教以礼仪，而使之改去禽兽旧俗矣。驱使汉人之技不晓者，则为之导以沿用秦之法律，唐之科举，宋之理学，明以来之官制赋税一切，而使之愚弄驭制此家奴有余矣。”他把这些汉人统称为“汉奸”^①。

毋庸置疑，革命派的“汉奸”话语完全颠覆了以往的官方话语。而且，他们把“汉奸”的帽子一顶顶地戴在了那些降清者的头上，发表着痛斥这些“汉奸”的言论，其中又以章士钊的《汉奸辨》最为著名。

章士钊是与黄兴共组华兴会的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革命派的代表人物，曾任《苏报》主笔。1903年，章士钊发表了《汉奸辨》，直言曰：“扶清灭明之吴三桂、耿继茂、尚可喜，助满洲歼灭太平王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今日之死汉奸也。如谄媚那拉氏枉杀中国义士之张之洞，为满清阻止中国游学进步之蔡钧，助满清官吏搜刮中国货财，孝敬满洲承抽各行之巨商劣绅等，今日之活汉奸也。”并有“真汉奸”与“假汉奸”之辨，宣称满人所称之“汉奸”是假汉奸，是汉族中的伟人硕士，“所谓真汉奸者，助异种害同种之谓也”^②。

孙中山在1905年初也曾撰文说：“中国之见灭于满清二百六十余年而莫能恢复者，初非满人能灭之、能有之也，因有汉奸以作虎伥，残同胞而媚异种。始有吴三桂、洪承畴以作俑，继有曾国藩、左宗棠以为厉。”^③在他与黄兴、章太炎等所制订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明确强调说：“驱除鞑虏……满洲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其满洲汉军人等，如悔悟来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杀无赦！汉人有为满奴以作汉奸

① 刘坤一：《驱满酋必杀汉奸》，《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二），第171页。

② 章士钊：《汉奸辨》，《章士钊全集》第1册，第158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

③ 孙中山：《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1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者，亦如之。”“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①

可见，排满是革命的头等大事，而打击“汉奸”又是进行革命宣传的头等大事，就连章太炎宣传国粹，也是与革命排满联系在一起，诚如他在演说中所言，“专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以发挥民族主义”^②。而当时的革命派成员邹容、陈天华，早年发表排满革命的刘师培，均重拾明清易代史旧事来传达满人欺凌汉人、汉人应奋起复国的声音。在形式上，邹容书《革命军》以白话，陈天华以弹词说唱，刘师培以历史教科书，陈去病写小说、戏剧，在他们的口诛笔伐中，民族的历史文化成为他们进行革命的素材与武器。

例如，陈天华的《猛回头》^③有曰：

想当日，那金元，人数极少；合计算，数十万，有甚高强！
俺汉人，百敌一，都还有剩；为什么，寡胜众，反易天常？
只缘我，不晓得，种族主义：为他人，杀同胞，丧尽天良。
他们来，全不要，自己费力；只要我，中国人，自相残伤。
这满洲，灭我国，就是此策；吴三桂，孔有德，为虎作伥。
那清初，所杀的，何止千万；那一个，不是我，自倒门墙！

陈去病在致力于以明清易代史构建反清斗争理论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辛亥革命前，他全力整理研究南明史，编写了不少明清易代的史料、抗清诗文，所辑录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五石脂》《明遗民录》等著作尤具影响力。他以诉说异族入侵的痛史，建构排满革命的图像。在《民报》中作《虎伥遗恨》，揭露“汉奸”丑陋，所记“汉奸”第一位就是吴三桂，其次有施琅父子、李光地等。文曰：“吴三桂率其丑虏，深入滇黔，穷搜缅甸，弑帝鸩后，躬行悖逆。”施琅假托父仇，效忠异族，“负恩郑氏，负恩明室，因以

① 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②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6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③ 陈天华：《猛回头》，第17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负恩于我中国。”李光地，名为理学名臣，却不知“严夷夏之大防，明春秋之本意”^①。

在痛斥“汉奸”上，刘道一最为激烈，他作《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一文说，“长城万里，老天设险以限华夷”，汉奸是“引入满人之媒介也”，到如今，要杀汉奸，必杀康有为、梁启超；必杀张之洞。必杀“庆祝立宪党”、必杀“各官吏之暴者”、必杀“各监督兵官之妖者”、必杀骑墙派^②。对明末清初的投降者及清朝的汉族达官显贵更是詈骂不遗余力。

因此，革命派的“汉奸论”集中了时代的特征，虽然，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并不为官方认同，也只限于革命派。但是，作为宣传革命的舆论，它在当时却起到了唤起民众的作用，在日后也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深入到社会民众之中。甚至在历经半个多世纪后、即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史学及文学作品中，把明清之际的降清者视为“汉奸”加以痛斥的，依然不乏其人。

如沈星棣、冯凤珠在《叛徒吴三桂政治活动中的阶级根源》一文中称：“吴三桂成为明朝统治集团中最反动、腐朽、顽固的阶层的政治代表后，是当时农民军最凶恶的敌人，而很快又堕落成汉奸叛徒。”^③熊笃在《试论洪升的民族意识——兼评章培恒同志〈洪升年谱〉的一个观点》中，认为“三藩之乱的性质是一场汉奸之间的火并或奴才与主子的纠纷。吴三桂是引清兵入关的大汉奸、民族罪人”。“明末降清并主动向清朝进献灭明奏折的汉奸奴才多达数百人，对这帮人的痛骂也是对民族投降主义的批判。”^④李季平于《试论王夫之的爱国主义思想》中，在赞扬王夫之的爱国情怀的同时，有论曰：“当汉奸吴三桂等以‘复明’为幌子，对清朝发动武装叛乱失势，并于康熙十七年扮演称帝丑剧时，一些汉奸伪吏竟想利用曾奋起抗清并一直坚守亡明臣节因而负有盛名的王夫之，担任写表劝进的角色。”^⑤叶君远在《也论〈圆圆曲〉——与姚雪垠先生商榷》中说：“《圆圆曲》是明末清初的诗人吴伟业的代表作，它以

① 有奶血胤：《虎怅遗恨》，《民报》第22号，第105~106页。

② 刘坤一：《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二），第183页。

③ 沈星棣、冯凤珠：《叛徒吴三桂政治活动中的阶级根源》，载《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4期。

④ 熊笃：《试论洪升的民族意识——兼评章培恒同志〈洪升年谱〉的一个观点》，载《求是学刊》1980年第2期。

⑤ 李季平：《试论王夫之的爱国主义思想》，载《齐鲁学刊》1980年第2期。

强烈的民族感情，狠狠鞭挞了卖国求荣的大汉奸吴三桂。”^① 张家哲在《究竟该如何评价范文程——与金成基、林明同志商榷》中称，范文程是“汉奸刽子手”^②。刘世南的《吴伟业论》也强调：“洪承畴和吴三桂是一样的大汉奸。”^③ 甚至在翦伯赞遗稿《论南明第三个政府的斗争》中，也将明季降清的汉人官将统称为“汉奸”，文中指斥大大小小的汉奸，“大汉奸洪承畴”多次被点名，马士英、阮大铖、郑芝龙等都是“卖国投降的大汉奸”^④。凡此等等。就连文学作品中，也经常出现对明清之际的降清者予以“汉奸”的评价，有代表性的，诸如余秋雨的《一个王朝的背影》^⑤，李敖的《最后的肯定》^⑥，柏杨著《中国人史纲》^⑦，也都有将吴三桂等人称作“汉奸”。

不得不指出的是，这些学者中多有亲历抗日战争者，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亲日“汉奸”形象令他们深恶痛绝，他们的民族认同承载了中华民族遭受异族凌辱的记忆，翦伯赞先生的遗稿乃作于1940年，当时正是中国的抗日战争进行到最为艰苦卓绝的时期。所以，与其说他们痛恨明清鼎革中帮助满人入主中原的“汉奸”，不如说他们对亲日“汉奸”怀着一腔仇恨。

因此可以认为，称吴三桂等明清之际的降清者为“汉奸”的，是清末的革命派，不是明清之际的社会民众。“汉奸”语义中所凝聚的种族与民族认同并非发生在明清之际，“汉奸”也不是明清鼎革产生的话语。而革命派出于政治需要的“汉奸”话语所反映的种族认同，也绝非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民族认同。而且，梁启超的放弃“小民族主义”，提倡“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的“大民族主义”，以及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五族共和”主张，都在说明中国志士的民族认同最终是在认同中华民族及中国的过程中走向统一。

① 叶君远：《也论〈圆圆曲〉——与姚雪垠先生商榷》，载《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1期。

② 张家哲：《究竟该如何评价范文程——与金成基、林明同志商榷》，载《社会科学》1983年第8期。

③ 刘世南：《吴伟业论》，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④ 翦伯赞遗稿：《论南明第三个政府的斗争》，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

⑤ 余秋雨：《一个王朝的背影》，王列生主编：《20世纪中国名家散文精品》，第1056页，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

⑥ 李敖：《最后的肯定》，李敖：《中国文化论战》，第346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1年版。

⑦ 柏杨：《中国人史纲》，第353、357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